

论罗烨《醉翁谈录》对宋代通俗小说观念的理论建构

张莉 郝敬*

〔摘要〕 罗烨《醉翁谈录》不仅仅是一部记录宋代说话伎艺的小说话本合集,其更重要的文学史意义在于以《舌耕叙引》为代表,学习子部的传统小说观念,结合传统小说观念在宋代的理论创新,针对通俗艺术表现形式说话的主要特征,模仿《汉书·艺文志》小说家的理论阐述范式,构建起通俗小说的理论体系。其中,《小说引子》主要构建通俗小说的核心特征与社会功用,《小说开辟》主要构建通俗小说的表现技巧与艺术审美。通俗小说理论体系的形成,不仅影响了近古以来通俗小说的创作,也为传统小说观念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方向。

〔关键词〕 《小说引子》;《小说开辟》;《舌耕叙引》;《醉翁谈录》;通俗小说观念

中国古代小说发展至宋代,进入了一个分化与新变的阶段。一方面,传统观念下的子部小说,吸收了史部杂传、子部杂家等其他类别文体的特征,将自《七略》、《汉书·艺文志》以来形成的以言说理、以事说理的核心特征,充实为叙事与说理并重;另一方面,在汉魏以来的通俗曲艺表现形式的影响下,小说逐渐成为通俗曲艺中说话伎艺最重要的代表形式之一。随着后者的不断发展,说唱的内容或底本,渐次为文字记录与再创作,形成了通俗小说的文本。通俗小说的观念形成后,被各领域广泛接受,事实上取代了子部小说的说理特征,成为近古以来古代小说的主要观念代表。在这场变革中,说话伎艺在具体的技术层面对通俗小说创作的深刻影响固然是不可缺少,但我们也应注意到,宋人有意识地对通俗小说观念的理论提升,事实上导致了通俗小说在观念层面上对传统小说的替代。罗烨编撰的《醉翁谈录》,尤其是其中的《舌耕叙引》一卷,无疑成为本时期通俗小说观念理论总结的重要成果。“《醉翁谈录》中大部分资料出自唐宋,尤其是《小说引子》和《小说开辟》两篇重要史料,是考订话本年代的旁证。《小说引子》里有一首歌,末四句说:‘唐氏末帝称五代,宋承周禅握乾符,子孙神圣膺天命,万载升平复版图。’《小说开辟》里又有‘分州军县镇之程途’和‘新话说张、韩、刘、岳’等话,显然都是南宋人的口气。至少这两篇说话史料可以定为宋人作品,因而它所列举的小说也应是宋人作品。”^①因此,《小说引子》和《小说开辟》这两篇重要的理论文献,事实上反映了宋代说话艺人或话本的整理者对通俗小说理论体系的主体建构。

* 张莉,文学博士,南京大学博士后,210023;郝敬,文学博士,安徽大学文学院讲师,230039。本文为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55批面上资助(2014M551537)、江苏省博士后科研资助计划(1301007C)的阶段性成果。

①程毅中:《宋元小说家话本考辨》,《燕京学报》新5期,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一、《小说引子》中的“小说”指称

《舌耕叙引》作为《醉翁谈录》的开篇之章,较为系统地总结了说话伎艺与话本创作的理论经验,历来被学界所重视。但由于《小说开辟》一节记录了诸多当时的话本篇名,并从题材的角度加以分类,往往受到研究者更多地关注,而《小说引子》的考察则相对冷落,本文即重点考察《小说引子》。通读《舌耕叙引》,我们发现,罗烨这两篇文字的布置对《醉翁谈录》全书具有发凡起例的作用。《小说引子》从通俗小说观念的理论构成着手,重在阐述通俗小说作为一种文体或艺术表现形式的核心特征与社会功用;而《小说开辟》从通俗小说的实际表现着手,重在阐述为达到上述功用,小说的讲述者或小说文本的创作者应该具有的伎艺准备,并在例举各类题材的小说文本后,从审美层面评述了小说的艺术感染力。换言之,《小说引子》从“道”的层面统摄理论建构,《小说开辟》从“技”的层面丰富理论体系,两篇文字形成了一个有机的理论体系。而对这一体系阐述的安排,则明显承自于史家对学术流派的经典阐述方式,如《汉书·艺文志》对诸子十家先总括后例录的范式传统。

《舌耕叙引》的文字较之《醉翁谈录》收录的小说文本,立意非俗,语辞雅正,多用典故,四六成句,明显体现出与说话伎艺追求通俗易懂、富于表现的侧重不同。这样的文字正适合对一种艺术表现形式进行理论的总结与体系的建构。而篇首、篇末往往有回前诗、回末诗,则无疑是对宋代当时说话习惯的文本沿承。这种体例,本应是话本对说话伎艺的原貌实录,之后被留用至具体的作品文本如明清章回小说的撰写方式中,但在这里被生动地应用于对通俗小说学术性的理论阐释,不能不说是一种吸收时代性特色的积极尝试。不论是之前还是之后的相关理论文章,这样的行文方式还是极为少见的。另一方面,撰写此篇的著者,不管是罗烨还是书会才人,既具备了说话伎艺的知识储备,也具备了学术架构的素养基础,使其无疑成为总结说话伎艺理论和奠基通俗小说理论的最适宜人选。

《小说引子》题下云“演史讲经并可通用”,而《小说开辟》则未云。那么,我们可以理解为,《小说引子》中的理论阐述,通用于南宋说话四家中的小说、演史、讲经三家,而《小说开辟》中的作品举例与艺术效果,则仅限于说话四家中小说这一家。罗烨重点表述的对象十分明确,即为小说伎艺或记载说话内容的小说文本。

回前诗作完,《小说引子》开始了主旨的阐述,即对“分人数等”与“世有九流”的论述。其云:

自古以来,分人数等:贤者清而秀,愚者浊而蒙。秀者通三纲而识五常,蒙者造五逆而犯十恶。好恶皆由情性,贤愚遂别尊卑。好人者如禾如稻,恶人者如蒿如草;使耕者之憎嫌,致六亲之烦恼。如此等人,岂足共话?

这种将历史人物大致区分划类的简单品评,对通俗小说的编撰者而言,勉强可以算是对社会规律的既有把握。但以上论述仅仅是一个类似于说话的话头,罗烨的真正目的在于引出后文对小说家社会地位的正式认可。其云:

世有九流者,略微题破:一、儒家者流,出于司徒之官,遂分六经辞赋之学。二、道家者流,出于典史之官,遂分三境清净之教。三、阴阳者流,出于羲和之官,遂分五行占步之术。四、法家者流,出于理刑之官,遂分五刑胥吏之事。五、名家者流,出于礼仪之官,遂分五音乐艺之职。六、墨家者流,出于清庙之官,遂分百工技事之众。七、纵横者流,出于行人之官,遂分四方趋容之辈。八、农家者流,出于农稷之官,遂分九府财货之任。九、小说者流,出于机戒之官,遂分百官记录之司。

罗烨的处理十分聪明,他再次借用了班固《汉书·艺文志》诸子略中对诸子十家模式化的品评例法,

将“分人数等”进一步扩展到“世有九流”，看似是对前文分类的进一步细化，也符合逻辑。但罗烨在这里偷换了品评的对象和分类的标准，把前文讨论平常世人的范围，跳跃到具有一定学术思维、形成一定学术思想的学者范围，这就先入为主地拔高了作为平常世人身份、反映世人喜好的小说人的学术价值。这样的跳跃与拔高，十分隐蔽，不能不说罗烨或者通俗小说理论的总结与阐述者，已经具有相当的学养储备。

再具体看罗烨“世有九流”的论述。这里出现了两个问题，即“小说”的指称与“九流”的归属。先讨论“小说”的指称。罗烨将南宋说话四家中的小说人，作为“世有九流”中的“小说者流”的同一指代，是否符合《汉书·艺文志》诸子略中小说家的本意、是否符合小说发展的历史实际呢？我们需要作一考辨以正本清源。小说作为一门学科正式形成于汉代刘向、刘歆父子的校书行动，自此，小说的创作者与文本的撰写者被赋予了一个正式的学术化名称“小说家”，并且小说家作为当时诸子百家中较为重要的一家，作品被归类单独著录。这就是我们今天可见的《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对小说家性质和作品特征的纲领性阐述。小说的核心特征是说理，表现方式是以言说理、以事说理，而宋代说话伎艺中的小说所强调的叙事性与艺术感染力等特征，在小说学科形成之初，与传统小说观念完全没有交集。汉代小说观念形成之后，较长时间主导与影响了小说的作品创作与观念演化。经过漫长的南北朝时期，小说作品虽已经出现形式上的种种突破，在理论层面仍秉承《汉书·艺文志》的经典定义。一直到唐人修撰《隋书·经籍志》，我们发现，唐人并未对小说作品的表现形式与特征范畴做过多的开拓，他们更关注地是对汉代小说观念的深入挖掘，以言说理和以事说理的核心特征被持续强化^①。唐人的认知一直被贯穿始终，延续到五代。宋人具有开拓性的眼光，他们发现了大量小说或史部传记类作品中蕴含的叙事性因素，可以赋予读者审美的享受，特别是被唐人抛弃在小说范畴之外的传奇作品，更激起了宋人的兴趣。终于在欧阳修的主导下，经过修撰《崇文总目》与《新唐书·艺文志》的尝试，对小说的性质特征做出了重大的变革，将原本归属于史部杂传类等其他类别的大量作品纳入了小说的范畴，并将唐代传奇作品一并收入小说类，极大地强化了叙事特征在小说观念中的主体位置。从这时起，宋代说话伎艺中的小说一家的作品文本，方才与传统小说观念建立了联系。

说话作为一种通俗艺术表现形式，无法获得传统学术观念的接纳与认可，因此在历代史志书目里也没有被正式划类收录，可考的源流资料也就极为缺乏。而作为说话四家中的小说一家，大抵出现于汉魏时期，最具有代表性的莫过于鱼豢《魏略》所记曹植“诵俳优小说数千言”之事。相对于周秦时期的“优笑”，俳优小说“在‘优笑’基础上确立了口说的表演方式，提升了故事在表演中的重要地位，成为一种带有民间色彩的以娱乐为主的口说故事表演。由初具口说故事因素的‘优笑’到专门表演口说故事的‘俳优小说’，‘说’所体现的口头性与‘话’所体现的故事性获得进一步凸显，‘说话’逐渐从优人杂合众体的伎乐表演中脱离出来，形成一种独立的表演伎艺。”^②经过魏晋南北朝的发展，说话伎艺已经完全成熟独立。如隋朝的侯白即为当时著名的善于说话之人。到了唐朝，说话成为朝廷与民间皆喜闻乐见的表演伎艺，如郭湜《高力士外传》记载玄宗晚年喜欢听说话表演，元稹和白居易更通宵达旦地听“一枝花话”。在这样的发展形势下，叙事性较强的小说也逐渐成为说话伎艺中的主要代表，一定程度上成为说话伎艺的代名词。段成式《酉阳杂俎》曾记载有“市人小说”的指称，《唐会要》也记载有“人（民）间小说”的俗谓。那么，被大家耳熟能详的“小说”语词，既包含了传统学术观念的小说含义，也包含了通俗艺术表现形式的说话含义，这就为罗烨以此代彼，为通俗说话艺术的小说话本找到一个足以拔高学术价值的合理依据。

^①郝敬、张莉：《论中国古体小说的观念流变》，《明清小说研究》2013年第1期。

^②张莉：《从“俳优小说”看“说话”伎艺的初步形成》，《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

二、“世有九流”中“小说家”的羸入

在为说话伎艺中的小说一家找到一个学术门路相对正统的源流后,罗烨就继续沿着这个方向,仿照《汉书·艺文志》对诸子十家的归类,开始了对通俗小说体系的理论建构工作。其实,将先秦以来的诸子百家系统归类、分别论述,这样的学术思想在班固修撰《汉书》之前就已出现。司马谈《论六家要指》阐述了诸子学说中的主要代表阴阳、儒、墨、名、法、道六家,虽未著录其代表作品,但论述了各家的主要学术特征。两汉之际,刘向、刘歆父子更为自觉地沿承了学术总结的工作,在《七略》中将诸子学说单独归为一个大类,并在此大类中设立了十家主要的学术小类。班固修撰《汉书·艺文志》除了对这十家作品有极个别的调整、替换之外,基本沿用了《七略》的学术观点。但是,罗烨所云“世有九流”,并把小说者归入第九流,与《汉书·艺文志》的处理并不相同。《汉书·艺文志》中,小说家作为诸子十家的第十家出现,并非是第九家。同时,《汉书·艺文志》诸子略的序言还明确强调“诸子

表 1 历代史志子部与《醉翁谈录》分类比较

序号	《七略》 (《汉书·艺文志》)		《七录》		《隋书· 经籍志》	《古今书 录》 (《旧唐 书·经 籍志》)	《新唐书 ·艺文 志》	《通志· 艺文略》	《宋史· 艺文志》	《醉翁谈 录》	《明史· 艺文志》	《四库全 书总目》
1	儒家		儒部		儒	儒家	儒家	儒术	儒家	儒家	儒家	儒家
2	道家		道部		道	道家	道家	道家	道家	道家	杂家	兵家
3	阴阳家		阴阳部		法	法家	法家	释家	法家	阴阳家	农家	法家
4	法家		法部		名	名家	名家	法家	名家	法家	小说	农家
5	名家		名部		墨	墨家	墨家	名家	墨家	名家	兵书	医家
6	墨家		墨部		纵横	纵横家	纵横家	墨家	纵横家	墨家	天文	天文算法
7	纵横家		纵横部		杂	杂家	杂家	纵横家	农家	纵横家	历数	数术
8	杂家		杂部		农	农家	农家	杂家	杂家	农家	五行	艺术
9	农家		农部		小说	小说	小说	农家	小说家	小说家	艺术	谱录
10	小说家		小说部		兵	天文	天文	小说	天文	类书	类书	
11	兵书 略	权谋	兵部		天文	历算	历算	兵家	五行	道书	杂家	
		形势										
		阴阳										
		技巧										
12	术	天文	术	天文	历数	兵书	兵书		蓍龟		释家	小说家
13	数	历谱	技	讖纬	五行	五行	五行		历算			释家
14	略	五行	录	历算	医方	杂艺术	杂艺		兵书			道家
15		蓍龟		五行		事类	类书		杂艺术			
16		杂占		卜筮		经脉	明堂经脉		类事			
17		形法		杂占		医术	医术		医书			
18	方	医经		形法								
19	技	经方		医经								
20	略	神仙			经方							
21		房中										

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①,认为小说家并不能像前九家具有“通万方之略”的社会功用,将小说家排除出可观者的序列之外。那么,罗烨的处理是否是考虑到各家学说发展到宋代的现状而作出的符合历史实际的合理归纳呢?可以先通过表1考察历代史志著录下的诸子各家自汉代以来的一个发展趋势。

需要说明的是,表1选取了几种较为重要的历代史籍《艺文志》和《经籍志》作为各个时期的考察对象。先秦至两汉时期选取了刘向、刘歆《七略》(班固《汉书·艺文志》);因唐人修撰《隋书·经籍志》,很大程度上参考了南北朝萧梁时期阮孝绪编撰的《七录》,所以该时段选取《七录》作为考察对象;唐代选取了《隋书·经籍志》和《旧唐书·经籍志》,后者虽是五代后晋刘昫所编,但所录全用毋煚《古今书录》,仅收“开元盛时四部诸书”^②,所以放在此阶段考察;宋代选取《新唐书·艺文志》、《通志·艺文略》和《宋史·艺文志》与《醉翁谈录》进行比较,《宋史·艺文志》虽元人所编,但本自宋代历朝《国史艺文志》,“合为一志”^③,变动不大,所以放在此阶段考察;明代选《明史·艺文志》,虽清王鸿绪所总裁,著录篇幅大减,但本自黄虞稷《千顷堂书目》,体例不变,所以放在此阶段考察;清代选《四库全书总目》,虽非史志,但体例成熟,可作一观。

从表1可以看出,在唐人之前,经籍的分类处理多用六分法;《隋书·经籍志》修成后,四部遂为定例。四部之中的子部,基本由《七略》中的诸子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或《七录》中的子兵录、术技录为主体演化而成。《七略》和《七录》中,小说家位于第十家,这表示汉代至南北朝时期,小说家在诸子中的位置没有发生变化。但自唐人修《隋书·经籍志》起,由于阴阳家业已消亡,小说遂上升到诸子中的第九家。包括《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等正史书目,小说家及其前八家的位置几乎没有变化,与《汉书·艺文志》和《隋书·经籍志》完全一致,仅仅是《宋史·艺文志》中的杂家和农家的前后位置出现调整。这一阶段中与正史稍有不同的是私人撰述的史籍,郑樵的《通志·艺文略》将小说置于诸子第十家,而用释家替代了阴阳家,诸子其余各家的位置完全没有变化。明清两代,由于学科的发展和著录标准的取舍,小说家在诸子中的位置差别很大,既有提高至第四家,如《明史·艺文志》所采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并名家、墨家、法家、纵横家等诸家入杂家的处理;也有下降至第十二家,如纪昀等四库馆臣在《四库全书总目》中对子部小说家的安排。因此,我们可以得出,在正统的学术观念层面,自唐代开始,由于阴阳家的消失,小说家已经上升到诸子第九家的位置,但这并不意味着小说已经进入了“九流”。小说由于“致远恐泥”(班固《汉书》)的性质判定,已经被附属于诸子之末,并且随着其他学术门类的出现和成熟,小说家的位置如《明史·艺文志》和《四库全书总目》的安排,依然可以随意被调整;其次,《四库全书总目》中的“小说家类”的序文和提要文字,也揭示出小说与时代的密切关系^④。此外,《小说引子》“世有九流”的总结还存在一个很大的讹误,即它保留了阴阳家在诸子第三家的位置,而省略了杂家在诸子第八家的位置。这种处理无疑是与学术发展的整体方向相反的,不知何故将唐宋以来已经消亡600余年的阴阳家重新提入诸子序列,却又碍于“九流”之称的苑囿,必须得将论述的主体小说家纳入其中,只能删去看似最无价值的杂家以确保论述的一致性。但是罗烨或者书会才人可能并不真正了解杂家“兼儒、墨,合名、法”^⑤的先天性,并不熟悉杂家在诸子学科位置的持续稳定性。这种特性甚至还一度被加强,如明清时期胡应麟撰《九流绪论》、黄虞稷《千顷堂书目》皆把杂家居于子部第二位。这不能不说是通俗文学

①[汉]班固:《汉书》卷三十,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746页。

②[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四十六,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963页。

③[元]脱脱等:《宋史》卷二百二,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5034页。

④详论参见张进德:《〈四库全书总目〉“小说家类”价值发微》,《明清小说研究》2012年第4期。

⑤[汉]班固:《汉书》卷三十,第1742页。

小说理论的构建者自身对传统学术有所忽视或积淀不足而造成的遗憾。

当然,我们也可以再进一步考察上述情况是否在宋代有一个发展特例? 罗烨的“世有九流”观点是否还有相同的支持者? 不妨通过表 2 具体考察宋代公私书目对学术门类的划分归类。需要说明的是,表 2 选取了宋代较为重要的几种公私书目作为考察对象,既有官修书目《崇文总目》、《秘书省四库阙书目》、《中兴馆阁书目》,也有私家书目《郡斋读书志》、《遂初堂书目》、《直斋书录解题》以及《文献通考》,并附列了明清时期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和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对诸子的分类。从表 2 可以看出,天水一朝,无论是官修书目还是私家书目,无论在子部对诸子做多少家的分类,杂家始终是诸子中的重要一家,并且多数情况下居于小说家之前,甚至在尤袤《遂初堂书目》中排在儒家、道家之后,居于子部第三位;而阴阳家几乎很少出现在书目的著录中,只有《秘书省四库阙书目》和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收录了阴阳家,但前者仅列在子部第 16 位,远低于同书收录的第六家小说家和第十家杂家,后者仅列在子部第 14 位,远低于同书收录的第八家杂家和第九家小说家。因此,《小说引子》“世有九流”依然将阴阳家收录,并排在儒家和道家之后的诸子第三家,省略了极为重要的杂家,这样的处理方式或学术认知,与宋代的主流学术观念是不相吻合的。退一步说,即使罗烨想创造一个有利于通俗小说发展的理论环境,对“世有九流”的构建也应该采取舍去阴阳家而保留杂家的基本模式。

表 2 宋代公私书目子部分类(附《少室山方笔丛》、《千顷堂书目》分类)

序号	《崇文总目》	《秘书省四库阙书目》	《中兴馆阁书目》	《郡斋读书志》	《遂初堂书目》	《直斋书录解题》	《醉翁谈录》	《文献通考》	《少室山房笔丛》	《千顷堂书目》
1	儒家	儒家	儒家	儒家	儒家	儒家	儒家	儒家	儒	儒家
2	道家	道书	道家	道家	道家	道家	道家	道家	杂	杂家
3	法家	释书	释家	法家	杂家	法家	阴阳家	法家	兵	农家
4	名家	子书	神仙家	名家	释家	名家	法家	名家	农	小说
5	墨家	类书	法家	墨家	农家	墨家	名家	墨家	术	兵家
6	纵横家	小说	名家	纵横	兵书	纵横家	墨家	纵横家	艺	天文
7	杂家	天文	墨家	杂家	数学	农家	纵横家	杂家	说	历数
8	农家	历算	纵横家	农家	小说	杂家	农家	小说家	道	五行
9	小说	兵书	杂家	小说	杂艺	小说家	小说家	农家	释	医家
10	兵书	杂家	小说家	天文历数	谱录	神仙		天文		艺术
11	类书	农家	农家	兵家	类书	释家		历算		类书
12	算术	艺术	天文家	类家	医书	兵书		五行		释家
13	道书	医书	历算家	神仙家		历象		卜筮		道家
14	医书	五行卜筮	五行家			阴阳家		形法		
15	卜筮	壬课	蓍龟家			卜筮		兵书		
16	天文占书	阴阳	杂占家			形法		医家		
17	历书	命术	形法家			医书		神仙家		
18	五行	相法	兵家			音乐		释氏		
19	释书	葬书	医家			杂艺		类书		
20	艺术		类书家			类书		杂艺术		
21			杂艺术类							

三、“世有九流”中“题破”辨析

细致的考察还可继续深入,我们不妨再对“世有九流”观点“略为题破”的点睛之笔作一比较分

析。前文已经谈到,罗烨选取《汉书·艺文志》诸子略作为自己构建理论体系的范式,那么我们就选取《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和与其体系极为相似的《隋书·经籍志》子部作为我们的考察对象。我们的关注点主要在于论述各家性质特征的小序,制表如下见表3:

表3 《醉翁谈录》与《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诸子十家的论述比较

诸子十家	《醉翁谈录·小说引子》	《汉书·艺文志》诸子略	《隋书·经籍志》子部
1. 儒家	儒家者流,出于司徒之官,遂分六经辞赋之学。	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阳阳明教化者也。……	儒者,所以助人君明教化者也,非家室而户说,故有儒者宣而明之。……
2. 道家	道家者流,出于典史之官,遂分三境清净之教。	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	道者,盖为万物之奥,圣人之至赜也。《易》曰:“一阴一阳之谓道。”……
3. 阴阳家	阴阳者流,出于羲和之官,遂分五行占步之术。	阴阳家者流,盖出于羲和之官,敬顺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此其所长也。……	
4. 法家	法家者流,出理刑之官,遂分五刑胥吏之事。	法家者流,盖出于理官。信赏必罚,以辅礼制。……	法者,人君所以禁淫慝,齐不轨,而辅于治者也。……
5. 名家	名家者流,出于礼仪之官,遂分五音乐艺之职。	名家者流,盖出于礼官。古者名位不同,礼亦异数。……	名者,所以正百物,叙尊卑,列贵贱,各控名而责实,无相僭滥者也。……
6. 墨家	墨家者流,出于清庙之官,遂分百工技事之众。	墨家者流,盖出于清庙之守。茅屋采椽,是以贵俭;……	墨者,强本节用之术也。……
7. 纵横家	纵横者流,出于行人之官,遂分四方趋容之辈。	从横家者流,盖出于行人之官。孔子曰:“诵《诗》三百,使于四方,……”	从横者,所以明辨说,善辞令,以通上下之志者也。……
8. 杂家		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兼儒、墨,合名、法,……	杂者,兼儒、墨之道,通众家之意,以见王者之化,无所不冠者也。……
9. 农家	农家者流,出于农稷之官,遂分九府财货之任。	农家者流,盖出于农稷之官。播百谷,劝耕桑,以足衣食,……	农者,所以播五谷,艺桑麻,以供衣食者也。
10. 小说家	小说者流,出于机戒之官,遂分百官记录之司。	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	小说者,街说巷语之说也。

需要说明的是,限于篇幅,表3中《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和《隋书·经籍志》子部各家小序,只摘引首句,未曾全引;《隋书·经籍志》子部尚有兵、天文、历数、五行、医方等五家,不再录引。从表3可以看出,罗烨对“九流”的性质特征评判与《汉书·艺文志》诸子略的各家小序中的评判有着直接的借鉴关系。罗烨所云“……者流,出于……之官,遂分……”的评判模式,与《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各家小序所云“……家流,盖出于……官,……”如出一辙。但仔细辨析仍有本质差别:《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各家小序,论述有例法所据,往往分为三个步骤,首先说明这一学派的渊源出处,大抵出自哪一类王官之守;其次再论述这一学派的主要学术特点,以及相关优点;最后批评这一学派的不足之处。通览诸子十家的小序,班固对各种学派的优劣品评,往往用儒家标准加以权衡考量。从整个学术的宏观角度考虑,班固这样处理,显然有其整齐划一,一目了然之用。罗烨选择这样的模式效仿,自然是可行的。但《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各家小序,论述的重点更倾向于后两个步骤,而罗烨的“题破”,仅仅停留在王官之守,以及王官之守的职责,而非这一学派的性质特点,因此与《汉书·艺文志》

诸子略各家小序还是有本质的区别。再看《隋书·经籍志》子部各家小序,唐人吸收了汉人学术论述模式的优点,并进一步深入各家学理的讨论,主动削弱或有意忽略了汉人作出的学派源流出于王官之守的判定,这其实是有利于各家学术更好发展的,也是学术发展的正确途径。对政治身份有意识的淡漠,往往更能提高学术的本体价值,这是唐人做出的努力。但这种尝试的真正价值并不被宋代的通俗文学理论的构建者所认可,书会才人此时需要做的理论准备只有一点,即为说话伎艺或具体到通俗小说找一个正统的身份认可,从而能够被普通听众或读者层面轻松理解而不必有较多的知识储备。因此,如王官之守这样看似华丽的外衣必然成为他们的惟一选择。当然,我们也可以这么说,对传统学术理论素养的欠缺,导致了书会才人无法驾驭真正的学术讨论,他们无法选择唐人正确的深入思考,也就只能将自己理论归纳停留在汉人理论体系中最外层、最简单的地方。

然而,即使是简单地套用,《小说引子》对小说家的“题破”还是发生了重大的讹误。《小说引子》云:“小说者流,出于机戒之官,遂分百官记录之司。”而《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虽阐述的重点各自有别,但对小说家的认知是一以贯之的,即小说家的来源是作为王官之守的稗官,小说家的性质特征与稗官的职能特征有一定的吻合^①。而上古时期至秦汉以来,又未见“机戒之官”的设立,不知罗烨依据何处?罗烨又云“遂分百官记录之司”,疑“百官”为“稗官”之音误。小说家是“街谈巷语,道听途说”的搜集、记录和整理者,而这又正是稗官的职能所在。相对于“世有九流”前八家对《汉书·艺文志》诸子略的基本正确的模仿,我们不能不指出,对通俗小说观念理论构建最为重要的小说一家,罗烨或者书会才人的模仿反而错讹得过于离谱。

在“世有九流”的体系构建完成后,《小说引子》通过“以上古隐奥之文章,为今日分明之议论”、“皆有所据,不敢谬言”强调通俗小说为现实服务的合理性与准确性,并通过“言其上世之贤者可为师,排其近世之愚者可为戒”,进一步阐述通俗小说以古鉴今、“听之有益”的社会功用。《小说引子》论述到这里,从通俗小说的核心特征和社会功用等角度看,已经完成了对通俗小说理论体系的基本建构。但这一篇文字没有完结,却举了一个适用于正式说话之前的引子的实例。从“[歌云]:传自鸿荒判古初”到“得其兴废,谨按史书;夸此功名,总依故事”,完全是一篇完整的说话引子。文末又用小字附注“如有小说者,但随意据事演说云云”,结合文中内容,则此段引子,理应是说话四家之一的讲史一家所使用。那么,《小说引子》的整篇文字布置,有论有例,从理论框架的整体构建看,却是极为贴切的。

四、《舌耕叙引》构建通俗小说观念的文学史意义

《小说开辟》紧承《小说引子》,继续拓展通俗小说理论的有机构成。除强调通俗小说的学术价值外,也刻意拔高通俗小说家的身份位置与知识储备,如开篇即云“夫小说者,虽为末学,尤务多闻。非庸常浅识之流,有博览该通之理”。文中按题材将通俗小说分为八个子类,也强调了小说创作者应具有的伎艺准备和通俗小说带给读者的艺术感染力。相关研究较多,这里仅略微讨论这些技术层面的理论阐述给传统小说理论发展带来的冲击。

通俗小说按作品题材分类,是对传统小说分类标准的一个创新。由于通俗小说是叙事小说,体裁单一,因此具备二次分类的合理性。而传统小说前期以言说理、以事说理,后期又将叙事作为主要特征,既有语录体、杂纂体,又有笔记体、传记体,体裁多样,无法按作品题材有效分类,所以直至清代,各公私书目中小说类的子目,往往阙如,即使分类如《四库全书总目》者,也只能以杂事、异闻、琐

^①郝敬:《宋前小说观念流变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南京大学文学院,2012年,第28页。

语作一大致分类。

传统小说理论体系秉承的是《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论述的例法,重在小说作品的社会功用价值的强调,往往忽略对作品创作技巧的理论归纳,这也是与儒家传统评判标准“君子不器”一致的。因此,我们看主流学术层面,即使到明清时期,各公私书目对小说的论述,依然无法摆脱“小道”、“可观”的经典化阐释。而一些作家则在具体的创作与撰述中,融入了创作技巧的理论思考,如清代小说创作观念之争,最典型的代表即清代言言小说《聊斋志异》的革新与《阅微草堂笔记》的坚守,而“宋元以来文人文言小说中插入诗歌是对唐传奇韵散结合的直接继承,而经过文人改造后的章回小说大量插入诗词,实现韵散结合,显然既是对民间说唱传统的不自觉承袭,同时也对唐传奇经典艺术形态的自觉借鉴”。正因为这样,韵散结合才成为与西方小说迥然不同的中国古典小说的经典形态^①。既然传统小说观念的核心特征与价值是对“小道”的宣扬,或补史之阙,则先天缺乏对创作技巧的主体追求,也就无从谈起对作品给予读者审美享受的有效把握。这种趋势一直延续并被传统小说家作为创作标准所恪守,所以当蒲松林《聊斋志异》出现了学习通俗小说创作技巧的时候,即遭到了传统小说家如纪昀的反对与抵制。但此时传统小说的创作已无法望通俗小说之项背,这不能不回溯到罗烨为通俗小说的兴盛所作出的最初的理论准备。

(责任编辑:陆 林)

Luo Ye's *Zuiweng Tanlu* :

A Construction of the Concept of Song Dynasty's Popular Novels

ZHANG Li, HAO Jing

Abstract: Rather than a mere collection of story-tellers' scripts recording story-telling skills in the Song Dynasty, Luo Ye's *Zuiweng tanlu* 醉翁谈录 is characterized by its construction of a theoretical system of popular novels in the Song Dynasty, thus gaining due significance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The theoretical pursuit of the book, as exemplified by Chapter *Shengeng xuyin* 舌耕叙引, is mainly manifested in its combination of the traditional novel concept and the theoretical innovations made in the Song Dynasty. In addition, it follows a pattern of theoretical elaboration of *Hanshu; Yiwén zhī* 汉书·艺文志. Among the different chapters each with a special focus, the article *Xiaoshuo yinzi* 小说引子 is intended to specify core features and social functions of popular novels, and the article *Xiaoshuo kaipi* 小说开辟 to elaborate the stylistic skills and the aesthetic effect of novels. The formation of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popular novels has not only influenced the creation of popular novels since the late Song Dynasty, but also pointed out a new direc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traditional novels.

Key words: *Xiaoshuo yinzi*; *Xiaoshuo kaipi*; *Shengeng xuyin*; *Zuiweng tanlu*; popular novel concept

^①吴怀东:《论唐传奇韵散结合的形态、渊源及对宋元以来小说之影响》,《明清小说研究》2013年第4期。